

域外文学论丛

YUWAIWENXUE
LUNCONG

主 编◎薛家宝 王晓英

对话与创新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
与比较文学研究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

河海大学出版社

主 编◎薛家宝 王晓英

域外文学论丛

YUWAIWENXUE

LUNCONG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

对话与创新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
与比较文学研究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与创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薛家宝,王晓英主编.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630-2529-9

I. 对… II. ①薛… ②王… III. 比较文学—中国、外国—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729 号

书 名/对话与创新

书 号/ISBN 978-7-5630-2529-9/I·67

责任编辑/周 勤 潘仲华

装帧设计/杭永鸿

出版发行/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电 话/(025)83737852(行政部) (025)83722833(发行部)

电子信箱/hhup@hhu.edu.cn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序

对话与创新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与 比较文学研究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对峙”转为“对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诉求——各种宗教、意识形态、种族、文明、文化间的对话，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对话，或呈大张旗鼓之势，或现和风细雨之态，使得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对话时代。

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正是通过各种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对话与交流，文学研究才能够始终保持着色彩纷呈的局面。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尤其如此。在这里，“对话”不仅在理论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进行，还体现在中国作家、批评家与外国作家、批评家之间。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中国学者特有的学术风格、视角与立场得以鲜明地展现出来。毫无疑问，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对话”不仅有利于相互了解和理解，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学术境界，使我们具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在盐城师范学院召开的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 2007 年年会，以“对话与创新”为中心议题，将中国文学作品与

外国文学作品、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放在一个“对话”的平台上，相互印证，相互参照，相互砥砺，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作品之异同。《对话与创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汇集了江苏省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们与外国作家、批评家对话的心得，是他们在新世纪辛勤耕耘、不断创新所获成果的又一次合力展示。

“对话”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创新”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对话，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只有不断创新，对话才能在更高的层次展开。在本文集中，很多学者自觉地将本民族的文学、文化置于人类知识与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观照。如陈义海的“培根的《谈读书》与《劝学》比较”，郝雁南的“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比较谈”等，都是通过分析比较，揭示了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在情趣意旨、题材观点，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异同或各具特色之处。而薛家宝的“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论王独清和篷子诗歌的两面性”一文则运用了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探讨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之一，老子的道家思想常常是中国学者用来与异国文化思想进行比较的对象。在本文集中，也有学者在中国的老子与外国思想家作家之间搭起了对话的平台，如，吴未央的论文“比较老子的‘道’和爱默生的‘超灵’”，探讨的是相似的宇宙观所衍生出的不同价值观；蔡宝玺的论文“‘上帝’临在的经验：肉身成道”则分析比较了老子的道家学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宗教观。所谓“自见者不明”，认识“自我”需要借助“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比较文学研究重在通过对话，达到互识、互证与互补，让人们既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民族的文学与文化。

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者来说，“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比较不同

国家的作家或作品之间的异同,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对话,彰显中国学者特有的认识角度和理解深度,以及中国学者特有的学术风格和立场。在本文集中,作者们的研究对象涉及到英国、美国、德国、爱尔兰、俄国等国的作家和作品,如刘剑锋对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古舟子咏》艺术手法的分析,唐岫敏、胡立伟等人对英国历史文化与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李怀波、李凯平、周思源、朱洪祥等人对多丽丝·莱辛、康拉德等英国小说家及作品的解读;再如王丽明、李淑玲、荆兴梅、冯岚、万雪梅等人对美国作家作品的探讨;还有冯羽对德国小说《香水》中的“互文性”阐释,李玉花对德国小说《朱丽小姐》的戏剧艺术魅力的揭示,李静对19世纪初爱尔兰两位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研究,以及朱建刚对俄国小说《母亲》与《彼得堡》的比较分析等。虽然他们的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外国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但无一不体现中国学者对外国作家及作品的独到见解;他们的研究大都分析深刻,细致得当,推论合理,发人深思。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集选编的论文有几篇出自几位刚刚步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子之手。可以说,年轻学者的展露锋芒,既为江苏外国文学研究队伍注入了生机,也显示出要与老一辈学者对话的意味。

“对话”意在消除隔阂、增进认识和理解,但常常功在“创新”。正是由于“对话”拓展了视野,更新了思维方式,所以“创新”也就势在难免。况且,文学研究要求人们思想敏锐,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对文本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也正是因为如此,“创新”成为了本届年会的另一个中心议题。应该说,“创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学会与比较文学研究学会的每一届年会都较前届年会有所创新,而本论文集的每一篇论文也都可谓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当然,任何创新对于明天来说,都会成为过去。因此,如果说这本论文

集体现了某些创新的话,不如说作者们阐发的一些新的见解,为今后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正如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在本届年会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研究是对明天的阐释,文学创作的创新在于创造可阐释的空间。对话引发了创新,而创新又是新一轮对话的开始。可见,对话与创新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推动这一循环不断前进的正是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界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学者们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面对江苏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守仁教授在本届年会上之所言——江苏外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很美好,明天会更美好。

薛家宝 王晓英

2008年7月

004

对
话
与
创
新



培根的《谈读书》及其王佐良的译文	
——兼及《谈读书》与《劝学》比较/陈义海	/001
痛极而笑,化痛为笑	
——评《第二十二条军规》与《等待戈多》中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柏云彩	/011
《红色英勇勋章》中遗传与环境因素对主人	
公影响研究/丛豪亮	/022
小说《香水》中的“互文性”阐释/冯羽	/031
与《记忆、权威和身份》一文商讨大屠杀的历	
史建构/谷娟	/040
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和杨沫的《青春之歌》	
中女主人公比较谈/郝雁南	/048
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	
——撒克逊-诺曼文化之冲突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胡伟立	/056
论《飘》中的反讽/荆兴梅	/066
《托马思·卡莱尔传记》	
——权力话语言说与商讨的产物/李怀波	/075
比德《圣徒卡斯布特传》中的叙事逻辑/李凯平	/087
叶芝诗歌在中国/李淑玲	/102
书信·自传·故事	
——读 V·S·奈保尔的《父子书信集》/李霄垞	/112

《朱丽小姐》的戏剧艺术魅力/李玉花	/127
奇异的梦幻曲 怪谲的蒙太奇	
——论《古舟子咏》的艺术手法/刘剑锋	/136
苦难沧桑史 辛酸抗争路	
——解析莫里森的《宠儿》、《爵士乐》和《乐园》	
“三部曲”/马 岚	/147
催生“新传记”的历史语境/唐岫敏	/160
如何面对婚姻中突然出现的“第三者”	
——解读凯特·肖邦的《一位正派女人受到的 诱惑》/万雪梅	/169
超越“伟大的欧洲传统”	
——面向 21 世纪的英美比较文学	
观述评/吴格非	/180
老子的“道”和爱默生的“超灵”	
——相似的宇宙观所衍生出的不同的 价值观/吴未央	/191
经典的对话	
——中国诗歌外交散论之一/徐同林	/200
浅析《黛西·米勒》中压抑的女性意识/姚 臻	/206
浅析古德曼·布朗悲剧的酿成原因/于 瑛	/216
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电影中形象的发展变化/张 聪	/227
多丽丝·莱辛《弃心记》中的现代主义实验	
浅析/周思源	/235

“上帝”临在的经验:肉身成道	
——再论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与老子的	
学说/蔡宝玺	/244
试析 19 世纪初爱尔兰两位女作家的小说	
创作/李静	/260
论“父与子”传统的终结	
——《母亲》及《彼得堡》之比较分析/朱建刚	/272
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实践论/唐 蕾	/285
重论伊迪丝·华顿的《夏》/王丽明 李淑玲	/292
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	
——论王独清和蓬子诗歌的“两面性”/薛家宝	/312
疏离:解读《黑暗的心》的孤独意识/朱洪祥	/322

培根的《谈读书》及其王佐良的译文

——兼及《谈读书》与《劝学》比较

· 陈义海 ·

自古以来,关于书的故事总是迷人的;同样,关于读书的哲理总是跟智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读书之道中西虽异,但培根的《谈读书》数百年来却一直那么有魅力,许多读书人依然能从他的这篇短文中获得启示。

一、名 家

提起培根,我们总是将他跟那句“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的名言联系在一起。不过,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1981)之后,人们越来越觉得“信息就是力量”(information is power)。在农耕时代,那些掌握了最好的耕作技巧和先进的耕作技术的人是最成功的;在工业时代,那些拥有最好的生产设备和最多的资金的人是最成功的;而在信息时代,拥有最多的信息的人才是最成功的。所以人们坚信,在当今社会,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整合信息的能力,他就是最有力量。这样一来,很多人便觉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已经过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信息本身并不是知识,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在被人接受之前,它只是客观地以不同

的方式存在着。坐拥书城并不说明真的拥有知识。“信息爆炸”时代,知识贫血症仍然到处可见,信息只有在被有效掌握之后才可以被称作知识。一句话,只有在你对信息这个对象“知道”了、认识了、掌握了,你才拥有了知识。“知识”这个词的英文 knowledge 的构词形式也体现了这个特点,要获得“知识”,首先得 know (知道、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强调信息的重要性跟强调知识的力量两者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夫勒和培根是一致的,强调信息与强调知识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识。因此,今天我们再读培根的《谈读书》并不过时。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 1564—1616)的同代人,他们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的骄傲。莎士比亚用他的戏剧叙说人世的悲欢,培根则用他的哲学和论说文追诘人生的哲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对培根的哲学可能了解不多,但他的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论说文。在培根之前,源自古希腊的唯理主义哲学十分盛行,学者们强调的是符合理性的思辨而忽视实践。培根则强调知识应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积累上;他强调了实践在获得知识上的重要性。从这种哲学观出发,培根的论说文多是根植于现实的。

培根的《新工具》、《新大西岛》在普通读者中似乎很少有人问津,倒是他的《论说文集》拥有广泛的读者。今天我们读到的《论说文集》是逐渐充实而成的。其初版(1597年)收入论说文10篇,1612年版收入论说文38篇,1625年版收入论说文58篇。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这个版本。散文在西方文学中并不是一个强大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主要是史诗和戏剧。培根之前,致力于散文或随笔这种文体创作的且影响较大的恐怕只有法国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据说,官至波尔多市长的蒙田在38岁时突然隐退回家,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自由、平

静、悠闲”的乡绅生活，躲进蒙田城堡的塔楼，研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且边读边记下心得，不知不觉在9年当中写成了几大卷文字。1580年，他把它们拿去出版时，不知该给它们取个什么名字好，因为以前的文学中几乎从未有过这种“随随便便”写成的东西，于是他干脆就取书名为“Essais”。essai一词在法语里本来是“试验”、“尝试”的意思；体育比赛中的试举、试跳、试掷，用法语说都叫essai。看来，蒙田出版他的书跟胡适当初出版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时的心情是相似的。大概是在蒙田出版了这两卷书之后，法语的essai始有“随笔”、“散文”之意，今天，我们便把他的书译为《随笔集》了。培根所写的《论说文集》英文叫essay，这个英文词跟法语的essai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培根写《论说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蒙田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把他的Essay翻译成《随笔集》，而是将之译成《论说文集》。

《论说文集》中的文章皆是短小精悍的小品文，主题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培根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他的许多论说文一方面是一个哲人的思考，同时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概括起来，它们主要涉及人与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上帝之关系。《谈真理》、《谈死亡》、《谈迷信》、《谈野心》、《谈虚荣》、《谈美》、《谈谣言》，一事一议，见解独到，鞭辟入里，雅俗共赏。所以，斯韦顿(Sweaton)说：“培根的《论说文集》可说是少数的‘世界书’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乃是为万国而作的；不是为一个时代，而是为一切时代的。”

二、名 作

《谈读书》更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这篇译成中文不足700字的短文，闪烁着一位哲人的真知灼见。

文章的第一部分重点谈到跟读书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读书

之目的、读书之作用、读书与运用以及如何读书。文章首先高度概括了古今之人读书之目的：读书可以“怡情”、“傅彩”、“长才”，并指出了这三种读书姿态在生活当中的具体表现。其次，作者又指出了读书的作用，并洞明了读书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读书是可以“补天然之不足”，并形象地指出，读书之于天性，犹如修剪之于花草。在这里，培根睿智地点明了“读书”、“天然”与“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其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从字里行间见出。文章第一部分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培根谈读书方法的那几句：“书有可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这里，培根再次用形象的语言将几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区别开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多情况下我们缺少的恐怕不是信息，而是如何处理信息；我们缺少的恐怕不是书籍，而是如何高效地去吸收书本知识，整合前人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培根的这种对各种书籍的区别对待的阅读方式，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培根认为，有的书“亦可请人代读”。这里所说的“代读”，在培根那个时代的贵族当中是常见的，但在今天，作为普通读者则很难做到。不过，今天有的人还是有请人“代读”的机会的，比如，硕导、博导们让自己的弟子代为收集整理资料，那是一般读者没法享受到的福分。现在的出版社所出的一些经典名作的简写本、提要，也可算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种代读。可是，这种“代读”太多了自然也会养成一种浮躁的习气。作品毕竟还是原汁原味的好，正如培根所说，“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

《谈读书》的第一部分已简略地提到了读书之作用，认为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文章的第二部分则重点就这一点展开讨论，同时，这一部分也是这篇文章论述特别有力、逻辑特别严谨的一部分，也是充分显现出作者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睿智的一部分。这里既有格言式的精辟，又有符合情理的推演。一开

始，作者便以格言警句的方式写道：“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书→充实”、“讨论→机智”、“笔记→准确”形成三重关系。接着，作者又用辩证的方式对自己提出的判断进行诘难，或作反向推演：即若不做笔记、不参与讨论、不读书将是如何。其中说到若不读书，则“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如果说对于不作笔记的补救办法尚可为人们接受的话，那么，从作者在反推当中所提出的，应对不读书的办法来看，实际上他是说不读书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从“读书”→“讨论”→“笔记”这一层面，作者进而专门探讨“读书”一项，换言之，作者这里是紧扣住读书这个主题展开论述的；或者说，是要明确回答为什么“读书使人充实”。跟以上三重关系相应地，作者提出以下几重关系：“读史→明智”、“读诗→灵秀”、“数学→深刻”、“伦理学→庄重”、“逻辑修辞→善辩”，论述至此，一句“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大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培根在他的《学术的进步》中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专心学问者，性格也受陶冶。”

如果以上属于正面论述，以下作者则对自己的关于读书的论点进行反论，即前一层次作者强调的是读不同的书可以使人怎样；接下来则是要回答人缺少了什么样的素质可以用什么样的学问来弥补。培根认为，“智力不集中”者，可用数学来弥补；“不能辨异”者，可用经院哲学来弥补，诸如此类。总之，“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而这药便是书籍。还需注意的是，培根为了引出他的这一层的论点，采用了譬喻的手法，用各种运动与身体的关系来譬喻读书对于人的精神的关系，十分贴切。

培根的《谈读书》又很自然会令我们想起荀子的《劝学》。无论从劝人读书这一点上，还是在强调读书对于人天性的改进上，或是在文章的论述方式上，两位哲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从以下可以见出：

首先，在学问或书籍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养成这一点上，荀

子和培根无疑是一致的。荀子认为：“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培根则坚信，“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表述虽异，其理却一。其次，在肯定书籍的工具功能方面，虽然荀子没有写出培根《新工具》那样的著作，但荀子却深深地意识到书籍对于“君子”的工具作用：“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培根作为近代思想传统的先驱，在《谈读书》中已明确强调了书籍的工具功能，他不仅仅认识到读不同的书籍可以养成不同的性格，同时也认识到，缺少什么样的素质则应该读什么样的书籍或做什么样的学问来弥补，尽管他在这里对工具功能的强调不如他在自己的著作《新工具》中来得那样明显。总之，无论是荀子还是培根，皆认为“君子”“善假于物也”。再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劝学》和《谈读书》亦堪称“姊妹篇”。两位哲人在时间上虽相距十多个世纪，但在劝人求学，催人上进方面，却是心有灵犀；在鞭辟入里，纵横捭阖的气势上，亦是难分伯仲。荀子的《劝学》以设喻见长，培根之《谈读书》亦善将抽象之哲理与事理连类。在设喻上都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总之，从《劝学》和《谈读书》，可以看到中西方哲人在诗心文心上的相通，在探究指善之理上的遥契，正如钱钟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三、名译

名作有如阳光，它必定不受时空的阻隔而撒向千秋万代，但隔着语言之栅栏的名作，其流传又有赖于翻译。好马需有好鞍配，他种语言中的名作需要优秀的译笔来再现。对于原作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人们历来总是持怀疑态度，人们总是怀疑，译作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原作的风貌和精髓。法国人甚至说：翻译像女

人——忠实的不美丽，美丽的不忠实。这更加使人们对译文不放心了。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并赏析培根的《谈读书》的时候，或许就有读者发问：你所赏析的是培根的《谈读书》，还是王佐良先生的《谈读书》。我们的回答是：既是培根的，也是王先生的。我们认为，王先生的译文《谈读书》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培根的 Of Studies 的精神。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欣赏培根的原作和王佐良先生的独具匠心的译文，我们将中英两篇文字都附在后面（编者注：因限于篇幅，此处略），因为现在通英文的读者毕竟多了。

培根的《论说文集》20世纪以来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的译本，或全译，或选译。每有译家翻译《论说文集》，《谈读书》一篇总是不会被放过的。王佐良先生虽然并没有致力于《论说文集》的翻译，但就他所译的少数几篇，尤其是这几篇当中的《谈读书》，是翻译界公认的难以逾越的“高山”。圈内人士甚至认为，就《谈读书》这一篇，王佐良先生以前的译文，虽各有千秋，但在文字上总觉火候不到，之后的译文，人们总觉得是对王先生译文的诠释。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的译文是如何处理培氏的 Of Studies 的。

首先，语体风格上的契合。培根的 Of Studies 在行文风格上跟今天的英语已经颇不一样了，英语也跟中国的文学语言有着时代“断层”的现象。乔叟虽然是英国的民族作家，但他的著作今天出版时，为了让普通读者读懂，也需“翻译”成现代英语。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培根所生活的时期虽然要晚于乔叟，但他所用的英语跟今天英国人所使用的英语也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对于今天英国读者来说，他的语言至少也可以说是半文半白了。所以，王佐良先生的译文的最大特点便是把握住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半文半白的汉语来翻译《谈读书》。“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徐徐品来，一股古雅之风拂面而来。顺便提一下，王先生用三个“足”来译原作中的三个“for”，既贴切，又体现了原作在细节上的特点。